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 浙學

朱利民 著

## 文化浙商与中国现代出版文化构建

Zhejiang Merchants of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  
Publishing Culture

教科书在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光明，  
点亮了：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  
民力已困矣。的幽暗洞穴。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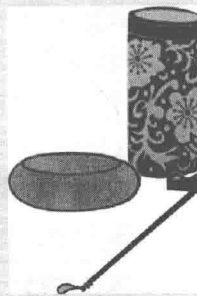
# 浙學

朱利民 著

## 文化浙商与中国现代出版文化构建

Zhejiang Merchants of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  
Publishing Culture

教科书在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光明，  
点亮了，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  
民力已困矣。的幽暗洞穴。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浙商与中国现代出版文化构建 / 朱利民著.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178-2153-3

I. ①文… II. ①朱… III. ①商业史—研究—浙江②  
出版工作—研究—中国 IV. ①F729②G2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0459 号

## 文化浙商与中国现代出版文化构建

朱利民 著

责任编辑 郑建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校对 穆静雯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0.5

字数 183 千

版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78-2153-3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 目 录

绪 论 .....	001
<b>第一章 浙商群体及其文化精神流脉探源</b> .....	003
第一节 浙商发展简史 .....	003
第二节 浙江出版文化与藏书文化 .....	010
第三节 浙商与浙江的文化事业 .....	014
<b>第二章 现代民营出版业与浙商群体</b> .....	020
第一节 近代以来现代出版的发展及其格局 .....	020
第二节 浙商群体与现代民营出版业 .....	025
第三节 以文学之名——浙江文人群体与现代出版 .....	033
<b>第三章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b> .....	038
第一节 江南望族之后——张元济的文化情怀与商务发展导向 .....	038
第二节 亦文亦商的博弈——文化追求与商业旨趣并行的典范 .....	043
第三节 翰林出版家的管理和运营智慧 .....	054
<b>第四章 陆费逵与中华书局</b> .....	063
第一节 桐乡才俊陆费逵——中华书局的创办与发展 .....	063
第二节 教育立国抱负与主营教科书的出版旨趣 .....	068
第三节 匡时济世情怀与中华书局的经营策略 .....	076
<b>第五章 沈知方、陆高谊与世界书局</b> .....	084
第一节 绍兴英才沈知方——世界书局的草创与兴盛(1917—1934) .....	085

第二节	名利的双赢——言情、武打等消遣读物与教科书、古典图书 并行出版 .....	090
第三节	绍兴英才陆高谊与世界书局的后期经营 .....	097
<b>第六章</b>	<b>章锡琛与开明书店 .....</b>	<b>102</b>
第一节	章锡琛与开明书店 .....	102
第二节	徐调孚等浙江才俊与开明书店 .....	111
<b>第七章</b>	<b>张一渠、吕子泉等文化浙商与儿童书局、大东书局 .....</b>	<b>116</b>
第一节	张一渠和儿童书局 .....	116
第二节	吕子泉、沈骏声与大东书局 .....	124
<b>第八章</b>	<b>张静庐、胡愈之与现代出版文化 .....</b>	<b>133</b>
第一节	张静庐与现代出版文化 .....	133
第二节	胡愈之与现代出版文化 .....	144
<b>结    语</b>	.....	151
<b>参考文献</b>	.....	153
专    著	.....	153
参考论文	.....	158
<b>后    记</b>	.....	160

## 绪 论

“浙商”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商人群体，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与辉煌的成就。明清时期，浙江的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已跻身当时十大著名商帮。近代以来，宁波、温州、台州等沿海地区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改革开放之后，“浙商”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成为中国当代商人中最富活力和创造力的独特群体。因此，当浙商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时，学界更多关注的是浙商群体创造经济价值的 ability。很多研究立足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侧重从经济、产业的角度，深入探讨浙商崛起的社会机制，着力于挖掘浙商群体独特的活力和贡献。如从经济操作层面的分析，就总结出了诸如“温州模式”“黄岩模式”等既具有地域特色又能体现浙江精神内蕴的模式。

近年来，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日渐重视，相继出台一系列扶植文化传播的政策。随着浙江文化大省建设步伐的加快，侧重劳动密集型生产、以加工制作为主的商业模式逐步转向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商业模式。这种现实的转变在浙商研究中也得到体现，即对浙商的关注已经不再仅注目于单纯经济层面的价值，而是注重对浙商人文精神的探索与开掘，“浙商的人文特性”“浙商的伦理精神”“浙商的人文传统”和“浙商人文精神”等课题，都是对浙商的人文精神、浙商人文底蕴的总结和建构。当然，对当代浙商的关注及其历史功绩的概括，仅是浙商整体形象塑造的一个层面。作为具有历史传统和丰厚积淀的商业群体，浙商本身是多元而丰富的，为此对浙商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当代社会，而是应该进行一番溯源和上下求索，跳脱出经济维度衡量的单一视角，将浙商的崛起、发展的步履与中国历史文明进程相结合，尤其是在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转型和文化建设的宏阔背景中，探寻浙商的文化功绩。

笔者以为，浙商群体是一个多元丰富的存在，浙商不仅以商业为依托，创造了经济价值，而且在文化创造方面也有瞩目的成就。浙商群体中历来有一部分从事与文化相关的产业，龙游帮的纸业、印刷业等都是历史的实证。现代中国活跃着一大批浙商，且文化浙商群体尤为突出。现代中国出

版三大巨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的背后，站立的是既创造了经济财富，同时又承担着扶助教育、开启民智、兴国强邦之重任，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文化浙商，如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等。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的半部是由鲁迅、茅盾、郁达夫、徐志摩等浙江作家书写的，那么现代中国出版文化的大半江山是由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等文化浙商打造和构建的。在以往研究中这一群体大多被纳入出版、文学领域，开掘其文学、文化贡献，忽视其商人的身份，更没有从浙商人文精神或者浙商文化向度的视角予以研究，这就使得文化浙商与现代出版文化的构建，以及对当代浙商文化转向的研究成为文化研究领域一种遗憾的空缺。近年来对浙商的研究中，这些在文化领域中活跃的浙商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关注。

本书鲜明提出“文化浙商”这一概念，认为文化浙商是被经济浙商研究遮蔽的巨大存在，着重对浙商人文精神予以溯源并探寻浙商人文精神的流脉。本书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浙商不仅是一个经济创造群体，更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人文底蕴的文化群体，有着丰富的文化流脉和精神渊源。第二，活跃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浙商不仅创造了现代出版的财富，而且是构建、发展现代出版文化的重要力量，积极推动了出版的现代化进程。换言之，中国出版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以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等为代表的一批浙商的参与。第三，对文化浙商的深入研究，尤其是通过对现代出版史上几大影响性出版商的分析，找寻浙商的人文精神流脉，探寻浙商文化转向的机缘和路径。在具体操作上，从出版这一商业和文化相结合的领域切入，选取现代中国出版中叱咤风云的浙商三大巨头——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世界书局的沈知方为主要论述对象，兼及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儿童书局、大东书局等中小书局的创办者，通过梳理文化浙商对现代中国出版文化的贡献，出版经济活动中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智慧，清晰地勾勒出文化浙商的人文精神，为现有浙商研究注入新的声音，为浙商研究范式中增添文化、社会的维度。同时关于现代出版业中张元济等文化浙商的挖掘和研究，也是对浙商整体形象的一种丰富和重新书写，是对浙商文化精神的扩充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 第一章 浙商群体及其文化精神流脉探源

## 第一节 浙商发展简史

浙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浙江就有了人类文明的足迹，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和杭嘉湖平原的马家浜文化就是其主要代表。<sup>①</sup> 在悠久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创新进取，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经济文化成果。这其中，浙江的商业活动和独具特色的浙商文化成为浙江发展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 一、古代浙商窥踪

浙江向来有重商的传统，商业习俗源远流长。浙商的远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谋士计然就提出过“农末(商)俱利”的思想。越国大夫范蠡在鞠躬尽瘁扶助勾践灭吴之后，弃官从商，“候时转物，逐什一利。居无何，则至货累巨万”<sup>②</sup>，被后人尊称为“商圣”“陶朱公”。

秦汉以降，得益于独特的沿海地理优势，浙江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会稽等地已与日本有贸易活动，《后汉书》载：“会稽海外有东鯷人，……时至会稽市。”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代相承，有数万家。《三国志》也有记载“其上人民，时至会稽货布”。《后汉书·朱儁传》中记有浙江上虞人朱儁，“母尝贩缁(丝绸)为业，同郡周规……假郡库钱百万，乃儁窃母缁帛，

① 滕复等：《浙江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 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一》(第 5 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752 页。



为规解对”。可见当时丝绸贸易的繁荣与规模的可观。

隋朝统一之后，杭州作为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也是东南交通的枢纽，“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sup>①</sup>。唐代时，杭州已发展为商业繁荣的大都市，据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记载，宪宗元和（806—820）时杭州每年税钱达50万缗。其时全国一年的商税为1200万缗。杭州一个城市竟占据全国商税的1/24，足见其商业发达程度。<sup>②</sup>明州（今宁波）是遣唐使的主要登陆海港之一。《新唐书·东夷传》就有记载：“新罗（今朝鲜）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越州（今绍兴）、杭州、温州、台州也都是对外贸易港口，当时著名的东海航路，就是以明州港为主轴的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干线。<sup>③</sup>在朝贡之外，民间贸易也十分活跃。泛海兴贩的中国大商人如李邻德、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人，都自建海舶以船主身份多次往来于日本和浙江的明州、温州和台州之间。<sup>④</sup>

宋代，特别是宋室南迁之后，杭州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两赤县市镇》）。《梦粱录·卷十八·民俗》中记述：“杭城风俗……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着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有辨认是何名目人。”茶叶、丝绸等江南特产在杭州集散交易。欧阳修曾言当时的杭州是“四达之冲，舟车之会”，“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sup>⑤</sup>，同时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官商驰骛，舳舻相衔，昼夜不绝”<sup>⑥</sup>。宁波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中心“三司”（广州、杭州、明州）之一，是海外贸易的必经之地，格外繁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sup>⑦</sup>。赵汝适《诸蕃志·新罗国》记载：“商人……兴贩必先至四明，而后再发，或曰泉之水势渐低，故必经由四明。”同时，明州成为中国与国外通航的重要海港，“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资丰衍”<sup>⑧</sup>。民间贸易方面，到海外经商的浙江人也很

① 《隋书·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95页。

② 转引自尹铁《浙商与近代浙江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③ 杨铁清：《浙商简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④ 木官泰彦：《中日交通史上》，陈捷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39—144页。

⑤ 欧阳修：《有美堂记》，见黄公渚选注《欧阳修文》，崇文书局2014年版，第84页。

⑥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三》，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⑦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861页。

⑧ 张津等：《乾道四明图经·卷1》，见《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

多。据《高丽史》记载,去高丽经商的浙人,公元1031年6月有台州商人陈惟忠等六十四人;1038年8月有明州、台州商人陈亮、陈绩等一百四十七人;1049年有台州商人徐赞等七十一人。<sup>①</sup>

浙江贸易活动在元代进一步发达。《元史·食货志二》载:“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sup>②</sup>加之元朝政府在浙江的庆元(今宁波)、温州、澈浦、杭州四处设市舶司的贸易港,商贾往来频繁。当时的宁波“蛮夷诸番舟帆所通,为一据会总隘之地”(《至正四明续志》卷三)。其中澈浦“远涉诸蕃,近通福、广”(《元典章·卷五九》)<sup>③</sup>,温州则是“百货所萃,麇氓贾竖成附趋之”<sup>④</sup>。庆元也是十分兴旺,时人张翥撰诗写道:“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sup>⑤</sup>

明代的时候,浙江的海外丝绸贸易达到鼎盛,在明州设市舶提举司。万历年间,江南地区“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珠玉象犀,南金大贝。侏儒雕口,诸藩毕萃,既庶且富”。明朝末年,宁波经济发达,十分繁荣。“明自嘉靖、万历以后,进入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近代气息、值得重视的一个时代”<sup>⑥</sup>,明清时期,浙江的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成为十大著名商帮,涌现了红顶商人胡雪岩、“早期海外宁波商帮代表人物”吴锦堂、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七十二狗”<sup>⑦</sup>等知名浙商。一波波浙江人奔走于经商之路,使得浙商逐渐发展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群体。

明代在民间流传着有关地域商人的三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遍地龙游。”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龙游商帮的活跃程度与巨大影响。明代中叶之后,龙游商帮兴盛一时,与徽商、晋商、江右商、宁波商等并

① 陈炎:《古代浙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兼论浙江历代的海外丝绸贸易,见杭州商学院学报编辑室编《浙江商业史研究文选》(第一辑),1982年版,第9页。

② 宋濂等撰,阎崇东等校点:《元史中》,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373页。

③ 《元史·食货》卷九四。

④ 黄潜:《永嘉县重修海堤记》,见王颀校注《黄潜全集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页。

⑤ 张翥:《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见《元音》卷九,转引自潘同生编著《中国经济诗今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⑦ 《吴兴农村经济》记载:“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资本雄厚,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者。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三十万以上不过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所谓‘象’‘牛’‘狗’,皆以其身躯之大小,象征丝商财产之巨细也。”

称为十大商帮。龙游商帮尽管以县域命名，却远不止龙游一地，而是涵盖了当时衢州府所辖的西安、常山、开化、龙游、江山等县的所有商人，因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活动范围最广，积累资金最多，故以龙游商帮概称之。

龙游是“入闽要道”“金衢处徽之冲”。作为浙皖闽赣的交通枢纽，龙游是古代重要盐道饷道必经之地。明人徐复出说：“邑（龙游）当孔道，舟车所至，商货所通，纷宗填溢。”优越的地理位置为龙游商业活动的展开提供了基础。龙游经商之风起于宋代：“南宋时，韦塘村人朱世荣……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业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郡。”（民国《龙游县志·卷二四》）明万历壬子《龙游县志·风俗》记载：“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谚曰：遍地龙游。其积习可慨焉。”龙游人不畏路途艰辛，背井离乡从事商业活动。天启《衢州府志·卷十六》中说：“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而居家耕种者仅当县之半。”经商已成为龙游的鲜明特征，明朝隆庆一万历年间知县涂杰深察其俗：“龙游，衢之要邑也，其民庶饶，喜商贾，士则缉学缀文取仕进。”（《建龙游城记》）万历年知县万廷谦《申明乡约保甲条规》：“龙丘之民，往往半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远行商贾之风至晚明有增无减，愈来愈炽。叶敬君《禁米论》：“龙游之民，为商贾几半，耕者少。”（明崇祯《开化县志》卷一《建置志·仓储》）至清康熙间，“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康熙《龙游县志·余恂序》，卷四《田赋志附物产》亦有载）。古代缺乏精确统计，大体而言，从明嘉靖、隆庆、万历以及清康熙间，龙游从商人数有增无减。<sup>①</sup>

## 二、近现代浙商的崛起

明清之际，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列入十大商帮，为浙商的历史发展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清末以降，宁波、温州等地相继开埠，越来越多的浙江人投入实业救国的行列，创办各种实业。浙商群体步入整体崛起的良性发展态势，由此浙商成为近代商业的中坚力量。

法国学者小科布尔指出：“浙江帮完全统治着上海的商业活动，以致这

<sup>①</sup> 陈学文：《天涯贾客、无远弗届：龙游商帮的历史辉煌》，载《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一名词变得可以与‘上海财阀’和‘上海资本家’这些专有名词交替使用。”<sup>①</sup>近代浙商在上海的立足与强大,与上海开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姚公鹤在1917年的《上海闲话》中曾感慨地指出:“上海兵事凡经三次: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之役,为华界人民聚居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丰末太平军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租界之造因。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荣一次。……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sup>②</sup>据史料记载,上海开埠之初,其客籍移民中以闽广籍势力最大。但在小刀会起义之后,这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小刀会起义以闽广籍商民为主,起义被镇压之后,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对作乱的广东帮和福建帮进行了制裁,使闽广移民在上海受到严重打击。与此同时,受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而饱受离乱之苦的江浙一带的富豪和士绅们“争趋沪滨”。上海由闽广人的天下而变成江浙人的天下。到1885年,公共租界内的广东移民降到21013人,福建籍移民降至708人,而江浙移民则增至80908人。大量江浙文人投身于报馆、书局,成为现代出版文化的主体。<sup>③</sup>上海由此成为浙商风云驰骋的乐园,在上海实业界,有了“浙江帮”的称誉。在最能反映中国各区域商人群体在商界中地位和影响的上海总商会中,浙江商人长期掌握着最高领导权。从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到1929年总商会被改组的27年间,浙籍巨商14人次当选总理(会长),总任职年限达23年,当选总商会副职也达13人次;在历届总商会会董、会员中,浙江商人所占比例也都在50%左右,最高超过72%。<sup>④</sup>

浙商的经营行业囊括船运业、钱庄业和银行业、成衣业、珠宝业等,浙商在很多经营行业都起着领头羊的作用。以金融业为例,在近现代中国的金融发展史上,从钱庄业到银行业的约500年的演变中,浙商是极为活跃且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重要力量。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19世纪初,上海有4家钱庄以上的资本家家族集团共有9个,其中宁波就占了5个,分别是宁波镇海的方家、李家、叶家,慈溪董家和宁波秦家五大家族集团。1921年,上海的华人钱庄共有69家,其中绍兴人开的就有38家,宁波人开的有16家;1933年,上海72家钱庄中,绍兴帮占了37家。为此,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这样写道:“清代钱庄,绍兴一派最有势力,当时阻止

① [法]帕克斯·M.小科布尔《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本家》,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② 姚公鹤:《上海闲话》,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60页。

③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④ 陶水木:《论近代浙商精神》,载《商业经济与管理》2001年第1期,第60页。

票号势力不得越长江而南者，此派之力也。浙人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故能与票号抗衡，在南中独树一帜。其营业区域，在长江南北，且利用交通之便利，浸而蔓延各地。其大本营在上海、汉口二处，而南京、镇江、芜湖、九江等处，也在势力范围之内。”<sup>①</sup>在钱庄业之外，中国早期的商办银行，很多是浙商主办或者参与的。1897年，严信厚、叶澄衷和朱葆三位宁波金融家共同创办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07年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1908年成立的四明银行，1909年成立的浙江银行等，浙籍商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曾于1868—1872年间在中国进行地质地理考察，在将近4年时间里，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而东南部是他最早涉足也是接触最频繁的地区，他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详细描述了中国17个省的性格特点，对于浙江省的描述如下：“浙江省人，由杂种多样的人组成，……山地风土各异，沿海较为整齐，与福建相同。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宁波人在勤奋、奋斗努力、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一般的浙江人性格柔软，给接触者以好感。……宁波人是浙江人中的特殊分子，宁波人在上海的势力很大，船夫、水手的大部分都是宁波苦力，宁波出身的男佣正驱逐着广东出生的。然而势力更大的是买卖人，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广东商人作为大商人，要求和欧洲人一样的价格，而宁波商人则更看重小的、零碎的利润。宁波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宁波北部的慈溪人。”<sup>②</sup>利希霍芬以外来者的眼光敏锐洞察了宁波人的特性，而在近现代浙商中，宁波商帮的确是最为突出的显赫存在。

“一本万利开典当，二龙抢珠珠宝行，山珍海味南货店，四季发财水果行，五颜六色绸布庄，六洋顺风鲜货行，七星高照古董店，八字墙门开钱庄，九巧玲珑贯器店。十字街头开茶坊。”这是宁波近代《十字歌头》对浙商经营范围和经商心态的生动描绘。宁波素有“鱼盐粮食码头”之称，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李卫(1686—1738)在《宁波府志·序》中描写宁波的自然形势说：“宁郡六县，县皆滨海，蛟门虎蹲，雄峙海口，招宝一山，屏障大洋，西南自吟粤，东北达辽左，延袤一万四千余里，商船番舶，乘潮出没，无不取道

①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21页。

② [德]利希霍芬：《中国17省人的性格特点》，见沙莲香：《中国民族性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页。

蛟门,经由招宝。内则联络众省,外则控制东候,通省之门户,实亦东南一大关键。”到了清代,尤其是自1844年开埠之后,宁波成为重要的贸易城市。光绪年间《鄞县志》卷2记载:“西国通商,百货咸备,银钱市直之高下,呼吸及苏、杭、上海相通,转动既灵,市易愈广,滨江列屋大都皆麇肆矣。”物资集散,商贾云集。《上海四明公所缘起》记载:“盖甬人之旅沪,自明至清数百年矣。”到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万人。旅沪的宁波商帮被认为是“来沪经商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sup>①</sup>据《上海的发端》等资料统计,自清末至1930年间,在沪35种民营行业(如银行、交易所、航运、化工、染织、毛纺、水泥、仪器、灯泡、电表、钟表、五金、医药、印刷、烟草、南货、西服等等)的“沪上第一”,均由宁波帮企业家首创。

民国期间,宁波商帮持续发展,影响持续扩大。据中国征信所1936年编印的《上海工商名录》,上海工商界1836人中,宁波籍商人有453人,占四分之一。<sup>②</sup>1929年,魏颂唐在《浙江经济纪略》中论及宁波人说:“邑人富于冒险进取性,出外业航运及工商业者甚众,类多获利,在津沪等处执商界之牛耳。”宁波帮的冒险精神也令绍兴帮赞叹不已。1919年《绍兴旅沪同乡会季报》在论及宁波帮何以发达时说:“甬人善进取,富冒险性,故国内大埠、海外名都,咸有其踵迹,各帮各行,咸有其事业,其经商之魄力雄厚,其营业之范围广阔。”<sup>③</sup>宁波商帮的表现还曾得到孙中山的赞誉。1916年8月24日,孙中山出席宁波各界举行的欢迎会发表演说时,曾这样评价宁波商人:“今观宁波之情形,则又为浙省之冠。查甬地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sup>④</sup>

① 吴拯寰:《旧上海商业中的帮口》,见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② 杨轶清:《浙商简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③ 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09页。

④ 孙中山:《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1916年8月24日),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1913—1916》,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2页。

## 第二节 浙江出版文化与藏书文化

### 一、浙江的造纸业与刻书业

17世纪,英国哲学家、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兰西斯·培根曾说:“我们若要观察新发明的力量、效能和结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了……这三种发明将令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又从而产生无数的变化:印刷术在文学,火药在战争,指南针在航海。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现在很清楚地知道发明是来自中国的。”<sup>①</sup>印刷术的发明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有着重要影响。作为印刷术起源的中国,长期以来在文明发展方面占有优势地位。“到15世纪末,中国出版的书籍可能比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sup>②</sup>

人杰地灵的浙江,素有“文化之邦”的美誉。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中牙雕、骨雕、木雕等就已显示出精湛的雕刻艺术,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玉琮、玉璧等雕刻都异常精美;同时河姆渡遗址的印纹陶文化、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都彰显了浙江源远流长的文化印记。《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说:“其碑见在会稽山上,其文及书皆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楷,圆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也。”这成为浙江的石刻书的例证。

东晋时期,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当时浙江佛教文化很是发达,杭州的灵隐寺、宁波的阿育王寺、天童寺等都创建于这一时期,佛教的兴盛为后来大规模刻印佛经做了社会需求的准备。同时,东晋时期浙江的造纸业有了新的发展。东晋时期剡县剡溪(今嵊州曹娥江上游)和余杭的油拳村盛产藤纸。藤纸是质地优良的一种纸张,到唐代仍负盛名。此外,还有用破旧旧麻布制造的麻纸,质地精美,产量也多。南朝书法家写字多用麻纸,王羲之为会稽内史时,就曾把会稽郡库存的九万张纸赠送给谢安。当时在这种麻

① 李约瑟:《古代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转引自香港《大公报》1974年5月29日。

② 转引自[英]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



纸上涂一层黄色防蠹药物,称为黄纸。桓玄曾下令政府机关“诸用简者,皆用黄纸代之”,可见纸的产量很大,这就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做了主要物质材料的准备。<sup>①</sup>

唐代之后,浙江的造纸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省各地有很多造纸作坊。杭州、衢州、婺州、越州的上细黄白状纸,都是进贡的名纸。尤其是剡县的藤纸、玉叶纸,闻名全国。吴越国时曾有由拳纸,钱氏诸王书籍多用余杭县由拳村产的藤纸书写,当时温州还出蠲纸,宋程《三柳轩杂识》云:“温州作‘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吴越钱氏时供此纸者,蠲其赋役,故号蠲(纸)云。”宋代之后,出了藤纸,又以越州的竹纸更为知名。北宋苏易简《纸谱》云:“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浙人以麦茎、稻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越州的竹纸独步天下。北宋书画家米芾曾写就《越州竹纸诗》:“越筠万杵如金版,安用杭油与池茧。高压巴郡乌丝栏,平欺泽国清华炼。”在宋代,越州竹纸的质量广为人称道。南宋陈樵《复暄野录》卷下云:“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

正是基于优良的造纸条件,浙江成为全国最早刊刻书籍的省份之一。元稹在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任浙东观察使时曾为白居易所编的《白氏长庆集》作序,写道:“扬、越间多作书,摹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中也。”<sup>②</sup>这是中唐时刻印书籍的重要记载,因为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受到民众喜欢,所以就有将诗歌汇集成册,刻印出售。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序》中云:“雕版之兴,远在唐代。其初见于记载者,吴蜀也,而吾浙为尤先。元微之作《白氏长庆集序》自注曰:‘扬、越间多作书,摹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中也。’夫刻石亦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版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已有刊板矣。”<sup>③</sup>

五代吴越国自吴越王钱穆以降,钱氏诸王都信奉佛教,刊印了大量佛经,印刷规模、印刷数量都相当可观,留存下显德本《宝篋印经》、开宝本《宝篋印经》等实物,还有彩绘观音像等。吴越国的高僧钱弘俶与延寿所印佛教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者,共计六十八万二千卷(或本)。数量之巨,在

① 邵海忠、周以成、朱锦东:《浙江印刷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②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序》,见姚金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我国印刷史上可说是空前的。可见其时刻工、印工之众多。吴越印刷事业的兴盛与高水平的印刷技术,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实有承先启后之功。宋代杭刻冠于全国,而北宋杭州的刻印技术,实际上是受到吴越老刻工、印工的传授指导而发展起来的,有的刻工、印工可能还直接参加了宋初印本书的生产。<sup>①</sup>

宋代,浙江的印刷刻书步入鼎盛时期。北宋时,杭州已是朝廷的重要刻书基地。当时刊印经史书籍的官方机构有国子监、崇文苑、秘书省、国史院等,其中国子监最为重要。尽管北宋的国子监设在开封,可是国子监的很多经书、史书等重要书籍都是在杭州刊印的。如《周礼》《仪礼》《史记》《汉书》等都是“杭州刻板”。王国维对北宋杭州刻印的“监本”有专门的考证:“宋初淳化(990—995)中,国子监刊‘五经正义’,不知命何地镂板;至咸平(998—1003)中,《七经正义》,则刊于杭州。《仪礼疏》后有校勘经进官衔名,其中有‘杭州监雕印板’字样。”<sup>②</sup>除了承担国子监托付的刊刻书籍之外,当时知名的刻书机构还有“市易务”,这在苏轼的《乞赐州学书板状》中有详细记载。

到了南宋,浙江的刻书业更加繁荣昌盛。高宗建都临安之后,于绍兴十三年(1143),在钱塘县修建了国子监,所刊书籍称为“监本”。绍兴年间,临安府刊刻《仪礼疏》所使用的刊工多达160人。临安会子库印会子的工人,每日多达204人。国子监整理恢复并刊印了大量儒家经典和史书,同时对先秦汉代诸子著作、医书、算书、佛经和唐宋名家诗文选等,都进行了大量刊印。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记载,宋代监本有182种,其中大半为杭州刻印。“除杭州刻书最多、最精之外,浙江其他地区也都刻书,如绍兴、宁波、台州、严州、嘉兴、湖州、温州、衢州、婺州、建德等都有刻书并留传于后世。”<sup>③</sup>可以说,其时浙江的各种坊刻本、私刻本、官刻本、佛寺刻、学院刻都有很高的水平,在全国享有盛誉。

元代浙江的刊印事业不复宋朝的盛况,但总体来说依旧是全国书籍刻印的中心之一。杭州西湖书院刊刻了大量书籍。《辽史》《金史》《宋史》等大型史书,《农桑辑要》等重要图书都是在杭州刊印的,一些书坊还刊刻了元杂剧。

① 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②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4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页。

③ 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2页。